

何 频 / 著

羞

人

的

藏书票



大象出版社



作者漫像

高莽画

序

董乐山

近年来连续在各种报刊上读到何频的一些文章，觉得无论选题、见解、为文都有独到之处，不是一般的搬弄学问，也不是时下流行的附庸名人，读来清新隽永，掩卷后犹有回味。因此很想知道这究竟是谁用的笔名。一次与赵武平闲谈，因为武平是编读书报的，可以说是个消息总汇，想必知道甚至认识这位何频先生。

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原来何频就是武平的哥哥和平的笔名。而和平我是见到过的。去年四五月间，我应郑州越秀酒家的越秀学术讲座之邀，去那里作了一次讲话。和平从他

弟弟那里得到讯息，特地到旅舍里找我晤谈一次，因日程紧凑，时间不多，谈话时间不长。但我总的印象是中原不仅出豪杰，而且也出文才，和平为人质朴，但不拘谨，特别是由于我们两人（其实还有他的弟弟武平）兴趣相同吧，我们相见恨晚，谈得甚为投机。尤其令我敬重的是，和平以兄长身份，很以其弟武平在外的遭际为怀，殷殷告我多加照顾指点。其实我是在野之身，照顾无能为力，而指点也谈不上，因为武平的工作关系，他接触新的资料和讯息比我灵通多了。

正如武平几次同我谈到的一样，他们兄弟两人走上写作道路的情况与我们兄弟两人相似。他们都是从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开始的。不过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兄弟两人已慢慢有了自己的方向，武平主要是从事外国文学的介绍，而和平则偏重于“国粹”。难能可贵的是和平的兴趣涉及古今，人文各科都有涉猎，这不仅扩大了他的眼界，也有利于观察的深度。就我个人而论，我读他的文章，除了文章本身隽

永可读以外，每次都必有所获。我可以说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见闻有限，尤其是国内文坛，而和平的文章则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使我得益匪浅。

和平把这一个集子题名为《羞人的藏书票》，其实是过谦了。“藏书票”不假，因为集中文字谈的都是他喜读的书，但何来“羞人”之处？如今写“书话”的人不少，但很多是东抄西袭，拾人牙慧，像和平那样有独到之见的并不多见。但愿他再接再厉，多写一些，俟诸同好。

1997年8月酷暑于京华

目 录

- (1) 序……董乐山
- (1) 病夫的爱
- (5) 是否都过苦桥
- (8) 我为高阳先生辩护
- (12) 杭州还是汴州
- (16) 思考《曾国藩》
- (26) 读不动《白夜》?
- (30) 朴实是金
- (35) 也是排列组合
- (39) 启动精神
- (42) 咀嚼世俗人生
- (46) 书话《燕山夜话》
- (49) 听唱新翻《杨柳枝》
- (54) 倾听郑振铎
- (58) 《名家品书》的“豹尾”
- (61) 《书巢漫笔》的“本色”

(65) 直撷人心的梁晓声随想

(69) 读《杨绛散文》

(76) 书林里的布谷鸟

(81) 读书的传奇说不完

(85) 怵看新书

(89) 乐观的诗画交融

(93) 雅俗别论

(98) 书斋及其命名的感想

(102) 地摊上有我的签名本

(105) 评论的尴尬

(108) 哦,放松着读书

• (112) 告急“书话”

(116) 玩古董与买新书

(122) 明星比书更美丽

(127) 负伤的《左宗棠》

(131) 再说“乌鸦和狐狸”

(135) 一错二错连三错

(139) 错中错

(141) 算不算“佛头加秽”

(145) 名士的最后风流

(150) 书是如何令人着迷的

- (154) 不是末班车
- (159) 画家以外的黄宾虹先生
- (163) 志士·学人·作家
- (167) 有品乃贫的张元济
- (171) 大梦谁先觉
- (180) 晚年叶圣陶的执拗
- (185) 再弹一曲张伯驹的老调

- (191) 书荒岁月
- (200) 回味那种感觉
- (207) 买书故事
- (213) 羞人的藏书票

- (219) 画笔与随笔
- (222) 话说黄宾虹的年谱
- (226) 有过几本刘海粟传记
- (230) 从病夫到寿星的朱屺瞻
- (234) 简明扼要的《徐悲鸿评传》
- (237) 解析《作家的画梦》
- (240) 易露马脚的批评
- (243) 雅藏书作画

- (249) 自白和臆语

——跋

病夫的爱

傅雷的文化品格是一流的，这有他那丰富的译作及其对艺术精湛的阐释为证。高山仰止，何以探秘其心境呢？我把他的书信读过来读过去，先亲情，又旁及友情，试图梳理出他心绪的郁结。

对学问和人生，傅雷绝对一意孤行，常人所见怪的特行独立不足以概括他。“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楼适夷语）原本是位虔诚的入世之徒，但他和外界交流的通路被一阻再阻，才智的光，感情的热，便全部朝家庭内部汹涌泄来，由此释放出傅雷对儿子那种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伤残”的父爱。

仅用世俗的功利观来评判，傅雷教子是成功的，

因为傅聪毕竟成了闻名于世的钢琴演奏家。这结果足以对世人构成诱惑与刺激。中国的父亲们是最善于借助儿女的成长来圆梦的,中国的子女们偏偏又大多是善解父意,加上当时整个民族刚刚历尽“文革”的浩劫而惊魂未定,于是,在1981年8月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当三联书店初版和重印《傅雷家书》时,那一则“洛阳纸贵”的典故便在我们周围复活并重演。渐渐地,自然的三原色裸露毕现,从黑暗里倏忽走出的中国人揉了揉眼,定住了神,竟发现这眼前的世界原本充满了活泼可爱的无限生机与妙趣,注意力“哗”的分散开来……此刻,你再读《傅雷家书》,无论如何,其中教育的本质与方法激烈冲突形成的悖论惊心触目,那书的第一封信中提及发生于傅家“五三年正月的事”,便令人不忍卒读: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晚

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教人怎么舍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傅雷家书》第1页)

掩卷沉思的我,禁不住要问:音乐是什么?音乐

属于艺术；艺术何以行世？艺术连接着人生美好和快乐的情感，最终将陶冶出善良、健全的人类品格。然而，缘艺术而起的美育却在少年生命的哺育中生出了那般“罪过”，且使为父的良心“永久不得安宁”，这美育太沉重，实在让人不以为然。最近，《傅雷家书》的修订版又有了，主人的书信越发充盈，但这似乎已不太重要，只愿楼适夷先生当初所撰的《读家书，想傅雷》的代序，原貌保留其中。

傅雷爱音乐，亦通绘画。傅雷有对亲人的逼仄，还有对友人的琐屑。现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引傅雷为知己。是傅雷不为尘俗所蔽，慧眼识珠，最早发现黄宾虹国画艺术的杰出和宝贵。1943年至1945年，傅雷与客居北平的黄宾虹先生频频通信，书札集中达119通，谈的都是品画、求画、买画、卖画之事。释读傅雷那一笔娟秀清逸的仿唐人小楷的厚厚的手稿，虽不乏发人所未发之声，洋洋洒洒，纵论中西绘画之理，然也多有精打细算，喋喋不休，备述庶务理财之语。这些书札，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悉数影印，辑为《傅雷书信集》刊行，披览玩味之余，尤感画家80寿辰之际，1943年底，傅雷为其在上海筹办画展前后，一再在致黄氏的通信中备说繁细，这一组信件最见他的真性情，又最为可观。

傅雷偏执。罗曼·罗兰的《三大英雄传》由他译成中文，贝多芬不屈的精神磨难与亢奋，傅雷推敲释

义作“力”，实则作为一种刚毅生命的符号。那“力”感染作用于译者，发生了异化。于是，在傅雷的心理品格中，鲜有光亮，也缺少宽容、放达和冲淡，更不许天真烂漫存在。但，这“力”若不具有弹性且张过了“度”，僵硬和脆弱就势成必然。

1966年9月3日，“文革”狂飚初起，傅雷即携夫人朱梅馥双双弃世而去。其实，在此之前，游学巴黎的青年傅雷就有过一次未遂的自杀，原因是他与一欧罗巴女郎热恋复失恋，那回亏得友人刘海粟的妙助，方不致握枪自戕，才又为后人留下这诸多的书信奇文。

(1995年3月6日写，发表于《读书生活报》)

是否都过苦桥

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差异不可谓不大。同是人生的风景线,常人每每向往明丽而温和的“小桥流水人家”,有的人则苦苦追求苍凉又偏执的“古道西风瘦马”。这就是矛盾和反差。然而,当我们纵览古今,竟发现芸芸众生确乎是依赖着这两极的对立而存在,生生不息,连绵不竭,藉此维系着人类精神的生态平衡。

天赋人权固然不错,人生在世,个个都有受用文明的权利。丰衣足食,是物质的需求;闲情雅趣,为精神的享受。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人类可以借助高科技手段对自然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之时,谁可以不顾常理指责我们生理和感官的正当需求呢?但是欲望仍然要作怪,这现成的享用终有一日会滋生厌倦,喜新厌旧、困惑和不满便联袂而来。新从何来?事实上,相对于大众惯用权利的同时,始终仅有少数人思索着将文明翻新,自觉肩负起升华人类生活质量的

义务。温森特·梵·高便是其中的一位继往开来者。他渴求对生活的更新,实则着力于创造。因此,他别无选择地毅然踏上了苦桥。

“温森特的一生,是人所经历过的最为悲惨而成就辉煌的一生。”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在为其中文版《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所写的序言中如是说。不因袭传统,不坐享其成,惟独选择绘画艺术作为探索生活真谛的试验,梵高的苦难完全是自寻的。本来他可以按部就班,在伦敦或巴黎的闹市间当一名获利颇丰的画商,他却不容忍庸人用金钱亵渎艺术的真善美;本来还可以安分守己,做一位牧师,向芸芸众生重复着救世的童话并因此衣食无虞,但他非要把神圣的上帝从天堂挟持下人间,来直面现实的残酷。不是学习了绘画吗?干这一行当然是可以谋生的,可他不甘心出入沙龙为贵夫人和阔小姐画矫揉造作的肖像,偏要到阿尔的乡间去描摹令人眩晕的野太阳。他生病了,有大夫的医治护理怎么不好,但他竟认为好死胜过赖活着,便果断地将自己的生命还原于泥土和大地。人生苦短,梵高仅活了 37 岁,从他决意用绘画作为拓展人类精神空间的试验之日起,孤独、饥饿、疾病便毒蛇般交替袭来,连绵不断。梵高在备受折磨中渡过了苦桥,在人类精神守望的高空划过一道彗星般耀眼的光芒。我们观他的作品《星夜》,那大片的在天空上卷起漩涡的黄色和

蓝色,形成一团反复扫荡的扩散着的光束,岂不就是梵高烈火般的生命同宇宙浑沌之气的凝结?梵高自杀了,但是他的《花瓶中的十四朵向日葵》,用变化丰富的黄色和苍劲有力的笔触,表现出花朵怒放的神韵和葵花子成熟饱满的质感,最终衍变成了人类精神沉甸甸的收获。梵高的生活充满了苦和枯燥,同时又展示了欢乐和辉煌。

其实,梵高的苦,是智者的苦,是智慧的苦。惟有苦,有磨炼,人类精神才能升华。不仅是梵高,不仅仅是艺术家,还有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凡是自觉贡献于人类而不甘只坐享其成的人,谁不跨越苦桥呢?

诚然,苦桥上的风险极大。许多人挣扎在桥头,渡不过彼岸,成了殉道者。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用做买卖的眼光看,梵高的成功,实在太不划算。但苦桥连接着人生的两极,由此区分着平凡和卓越。我们在人世之初,不妨先读一读欧文·斯通的《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我们是否都过苦桥呢?

(1995年5月5日《读书生活报》)

我为高阳先生辩护

近年来,台湾作家高阳先生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在内地一版再版,大出洛阳纸贵的风头,这个现象值得重视。《光明日报》1996年3月6日出版的第60期“文化周刊”上,刊登了署名“松郁郁”的文章:《“胡雪岩”值得趋之若鹜吗?》。该文简略介绍了胡雪岩之后,明确指出:“《胡雪岩全传》所称道的‘胡氏商法’,基本上是一种‘明里暗里做人的工作’的方法,说穿了就是卖身投靠,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行贿受贿,搞种种幕后交易,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作者还一针见血地警告:“我们要看到,《胡雪岩全传》于80年代后期在内地开始盛行,绝非偶然,而是有一定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的,不能排除某些人希冀从这部书中寻找行贿受贿的方法和诀窍。”(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松郁郁的这番评论有一定道理。但是,他的文章又对作家高阳先生的写作动机和取舍材料的角度

做进一步的否定，这就显得鲁莽和草率了。这话是这样讲的：

问题在于高阳是把胡雪岩当做一个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对胡称颂备至。这样一来，胡雪岩的所有所为，包括恶行劣迹，或隐去不写，或把它变为值得称道的好事来写。由于《胡雪岩全传》文字通俗易懂，描写细致入微，情节起伏跌宕，再加上胡雪岩层出不穷的商战奇计，所以，很能打动人心。罂粟花是美丽的，但鸦片、海洛因却害人至深。艺术性愈高的文艺作品，其中的负面内容往往也愈容易被人接受。这就是《胡雪岩全传》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面对着日益澎湃激荡的国际反腐败浪潮，这番话大有将高阳先生指控为“教唆犯”，提请从速将其押上审判台之势，且慢，我要为高阳先生辩护——

是的，高阳在小说里是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塑造的，但文学典型的“英雄”并不等于现实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例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罗贯中虽然刻画出一副智勇兼备的曹操形象，但他竭力要宣扬的却是儒家思想的“道统”，书里描写的正面人物却是刘备。贸然批评高阳宣扬或隐匿胡雪岩恶行劣迹的说法实则也不符合《胡雪岩全传》的具体内容。

在我看来，高阳用的是皮里阳秋的创作手法。《胡雪岩全传》实质上是一部清末政治腐败的“暴露